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〇九期 ——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606e)

---

【本刊专稿】	拘禁江青：四位当事人的四种不同说法	余汝信
【回首文革】	昨夜星辰昨夜风	
	——青海日报“六·三”社论发表前前后后	陈逸
【当事者说】	陈伯达的第一次华北之行	王保春·王文耀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本刊专稿】

##### 拘禁江青：四位当事人的四种不同说法

• 余汝信 •

三十年前的“粉碎‘四人帮’”，标志着十年文革的最终落幕，更令举国一片欢腾！惟笔者近日在阅读有关资料时发觉，不同的当事人，对“粉碎”的具体过程，叙述上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是岁月使记忆发生了错位，还是另有隐情的故意扭曲？分析一下这些差异，以及这些微妙的差异意味着什么，倒应是颇为有趣且有一定意义的。

本文以拘禁江青的过程为例。涉及的四位当事人分别是：

张耀祠，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团团长；

武健华，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副政委；

邬吉成，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

马晓先，女，江青处工作人员，护士长。

当事人回忆的差异主要是：1、武健华是否参加了拘禁江青的行动？2、江青在被拘禁过程中的表现。她有没有说话？说了什么话？

## 一、武健华是否参加了拘禁江青的行动？

### 1、张耀祠的说法

“1976年10月6日下午3时，汪东兴主任通知我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到他办公室，正式给我们交待任务：‘中央决定在今天晚上8时统一行动，粉碎‘四人帮’。你和健华逮捕江青。’

“汪东兴同志还交待了逮捕方式：‘你去了向她说：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交出文件柜钥匙，不准打电话。’并说：‘对毛远新实行保护审查……你也一并解决。’”〔1〕

“时间到了，我同武健华和一中队指导员李连庆十几个干部出发了。江青当时住在中南海201号楼，这个地方过去经常去，每个角落我都很熟悉。晚上八时，我们先到毛远新住所，进到他的办公室，他们正在看电视。毛远新见到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立即站起来，关了电视机。

“我宣布：‘毛远新，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保护审查’，为了你的安全，还住在这里（中南海），但要换一个房间。现在你把文件柜钥匙和手枪交出来。文件和材料由中央办公厅派人来接收。你的生活、安全仍由李连庆指导员负责。不准向外打电话，要遵守纪律。你写的交待材料，交李连庆同志转送中央。’

“我宣布完后，毛远新骄横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没有再说了。他不主动交钥匙和手枪，我们一位干部上去收缴了他的手枪和钥匙。

“江青离毛远新住地很近，我和武健华同志在20点30分钟来到她的住所。”〔2〕

### 2、武健华的说法

“10月6日下午3时，张耀祠和我到了汪东兴南楼办公室，他要同我们商定当晚处置江青和毛远新的实施办法。汪东兴对张耀祠说：‘今晚8点钟，由你带上李连庆那个行动小组的四个人，先去把毛远新监护起来。你现在回去后，先找李连庆研究布置具体执行方法。处理完毛远新的问题后，你在丰泽园值班室等武健华带人来，然后你们一起去春藕斋拘押江青，由你向江青宣布中央的决定，对她进行隔离审查。你看这样可以吗？’张耀祠说没有问题，领受任务而去。”〔3〕

“押送张春桥的车上路后，我转身回到正厅。按预案，下一步就是速去中南海春藕斋执行拘押江青的任务。

“我急促地对汪东兴说：‘我和耀祠同志现在就到春藕斋去了！’

“汪东兴说：‘去吧！有什么问题随时同我们联系。看国锋同志、叶帅还有什么意见？’华、叶表示没有意见。

“我一路小跑离开怀仁堂，直奔宝光门，跳上隐蔽在那里的汽车，不到一分钟，就在丰泽园后门停下。对付江青的行动小组，现正隐蔽在这条马路的一侧。我向他们打了个招呼，就进

入丰泽园值班室。室内无人，我意识到毛远新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急忙经过菊香书屋门前，径向颌合堂走去。只见毛远新两眼直视地坐在正厅的一把椅子上。张耀祠在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并下掉了毛远新的手枪后，正在训示其必须老实服从管理规定。我从侧后轻声地对张耀祠说：‘时间很紧了，我们走吧！’

“他回头看到我，又向在一边的李连庆低声交代了几句，我俩就迅速出了丰泽园后门，并肩直奔春藕斋。行动小组的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紧随其后。三辆轿车也徐徐开进春藕斋东侧广场。

“我们直接进入春藕斋前厅。这里是秘书、警卫、医护、司机人员聚会和休息的地方。我们到来时，他们有的在聚精会神地看书，有的在弯腰捋袖洗衣，有的在前倾后仰地玩扑克。看到我们来此，虽然不明原委，但都是几乎天天见面的熟人，既不生疏，也不紧张，一一都咧嘴微笑。

“张耀祠跟在场的工作人员笑嘻嘻地说：‘在吧（指江青）？’大家都会意地点点头。

“与此同时，我把为江青开车的老申同志叫到一边，‘请你把停在门前的车，马上开回交通科’。又对开保险红旗轿车的史友令说：‘你把车停靠在门前明廊上车处。’他们都一一立即照办了。接着我告诉原在江青处工作的警卫参谋周金铭：‘小周，你前面带路。’我确知，晚饭前汪东兴已给周金铭透了一点‘风’，小周心里是有数的。回转头我又跟站在我们身后的女护士马晓先说：‘你也来！’室外应该准备的事情打点就绪后，张耀祠和我及行动小组，不动声色地推门进抵春藕斋正厅。”〔4〕

### 3、邬吉成的说法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先后进了怀仁堂，由华国锋依次向他们宣布：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们‘隔离审查’。然后依次被抓起来，一个一个地押进停在怀仁堂东面红旗车里。

“我在怀仁堂外面看见怀仁堂的东侧门里，隔了一会儿开出一辆红旗车，共开出了3辆，但当时开去哪里了，我并不知道。

“王、张、姚的事一处理完，华国锋、叶剑英指示耿飚，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随后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这里，武健华从怀仁堂里走出来，他对我说：‘汪主任说了，要你给张耀祠打一个电话，问他那边的事搞完了没有。’我这才知道，张耀祠带领着另一个小组，执行着对江青、毛远新‘隔离审查’的任务。

“我马上把电话打过去，张耀祠告诉我：‘我们这边的事情已经顺利结束了。’我把张耀祠的话告诉了武健华，武健华说：‘都完了，那咱们也去宣布吧。’我们一起走向王、张、姚等随从人员集中的院子。”〔5〕

### 4、马晓先的说法

“马：我记得10月6日是个星期四，那天不是我值班。大约是下午临近黄昏的时候（按张耀祠的说法是约8点钟的时候），我正在宿舍里洗衣服，脚上只穿了一双拖鞋。忽然，中央警

卫团的团长张耀祠来到我身后。

“我看见他时还说：‘呦，张团长怎么来啦？’张耀祠说：‘有点事，你跟我来一下。’我以为是工作上的事情，就说：‘今天不是我的班啊。’他说：‘那也得让你去一趟。衣服就别洗啦，快去换换衣服，换换鞋。’当时不知是怎么的，这么匆匆地被他叫走，分明地感到有些异样，但内心却一点也没有感到突然和惊异。

“我跟着张耀祠走到江青所住的中南海 201 寓所的外门，就看见有几位全副武装的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这种情况是以往在江青身边从来没有过的。我感到有什么大事发生了，但我仍然没有产生特别意外的感觉。

“当然，看到这种阵势，我心里也不是没有思考。我记得刚刚到钓鱼台，被安排到江青身边工作的时候，江青曾经对我说过大致这样的话：你们到我这来工作，要有思想准备。我要不就不上去，干一番大事业；要不就可能成为阶下囚。我此刻下意识地感到，江青当初所预计的那第二种情形降临了。”〔6〕

为马晓先作口述回忆记录的王凡，亦是邬吉成口述的整理者。他为整理邬的口述，曾参考了张耀祠写的回忆录，他发现，张在回忆录中称，对江青实行拘禁时，是与武健华一起去的，可是，邬吉成在叙述中却十分肯定武参加了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的拘捕行动，行动结束后，武从怀仁堂出来，还要邬给张耀祠打电话，问江青那边的行动结束了没有。因此，王凡认为张、邬两人的回忆，必定有一人出现了偏差。故而王凡要求马晓先仔细回忆一下，武健华究竟有没有参加拘禁江青的行动？马回答道：“我清楚地记得，武健华当时并没有到江青这儿来，他没有和我们一起行动。当时我们这边在现场的领导，只有张耀祠一人。”〔7〕

## 5、简单的综合

四位当事人中，称武健华参加了对江青行动的两人——张耀祠、武健华本人。惟两人的说法中又有细微的不同：张耀祠称他是与武一起先直接到了毛远新处，再一起到江青处；而武健华则说他是参加了拘禁王洪文、张春桥的行动后（武称拘禁姚文元是在拘禁江青之后他才单独去处理的），独自一人赶到丰泽园毛远新住处与张耀祠会合。

指武健华并没有参加拘禁江青行动的也是两人——邬吉成及马晓先。

2：2 的局面，使我们十分为难——让我们相信谁？

然而，武健华有没有参加此一行动，难道真的那么重要么？

是的，表面看来，并不重要。但因为武健华坚称自己到场并为后人留下了详细的“我在现场”的记录，故而，联系到下一个问题，他是否真的在场，也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 二、不同版本的拘禁江青过程的“现场记录”

### 1、武健华的“现场记录”

“行动小组的成员进屋后，迅即从左右两侧和沙发背后把江青围拢在一个半圆形的中间。江青仍然坐在那里，一副愤怒、凶猛、铁青可憎的脸上，显现出忐忑不安的惊惧。瞬时又故作镇静，木然地抬起右手，扶了一下眼镜，侧着头面向张耀祠和我，‘你们要干什么’？她首先发

问。

“张耀祠站在江青的左前方，他以习惯的军人姿态，威严地说：‘江青，你不听中央的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阴谋篡党夺权。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张耀祠又责令江青，‘你到另外一个地方，要遵守纪律，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

“江青伸长了脖子，瞪着眼睛问道：‘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的？’

“我不耐烦地叱责她：‘中共中央是什么，你难道会不明白？’

“江青改口：‘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

“张耀祠立即明确地正告于她：‘我们是奉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执行中央决定的。’我说：‘快！马上离开这里。’

“江青：‘那我这里的文件呢？’

“张耀祠：‘我们会有人接管的，你把钥匙交出来。’

“江青：‘那不行，这里许多都是中央的机密，我要对党负责。钥匙，我只能交给华国锋。’张耀祠：‘那好，你把它装在信封里由我转交。’

“江青依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上身前倾，用铅笔在一张信笺上，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接着她又在一只印有红框的大信封上，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她把钥匙用一张信纸包好，同信笺一起放进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两端，粘贴了‘密封签’，并用手在‘密封签’上用力地按压了几下，顺手把信交给了张耀祠。

“我急得火燎燎的，再次督促她‘走！快走！’

“江青拿掉了膝盖上的小被子，整理一下衣服，两手按着沙发扶手慢慢地站起来。临出门之前，她又要上卫生间。江青尿急尿频的毛病，由来日久，不以为怪。为防不测，我叫女护士马晓先同她一起进去。本来她过去到卫生间，有时也要护士陪同。

“离开春藕斋正门，穿过十几米的暗廊到达前厅。这里靠墙停立着一个多功能的衣架，江青取下一件深灰色的披风，马晓先帮她戴上帽子，系好带子，走向停车处。

“江青固然是个为人奸狡刁猾、残忍刻薄、心毒手辣、则天武后之心不死的野心家，但在今天这些凛然、魁伟的军人面前，她又拿出了巧使顺风船的本领，虚伪地夹起了尾巴。既然她肯于俯首顺从，照指示行动，且无力反抗，也就没有加铐于她。

“行动小组人员，把重重的保险车门打开，江青坐在后排中间，黄介元、马盼秋分坐两侧，护士马晓先坐在二排副座面对着江青，组长高云江就坐于司机旁。前后各有一辆警备车，我坐在后车的指挥位置上。我们都身带短枪。前后车上的警备人员，并备有速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三辆车迅速驶离原‘居仁堂’广场。

“带路车司机张中臣，是一位经常开先驱车的驾驶员，为紧随其后的两辆车开道。江青坐在保险红旗轿车，驾驶员是沉着老练、技术娴熟的史友令。

“北京主要街道的交通警察，个个目光犀利、精明机灵，他们知道保险红旗的‘身份’，中央只有几位核心领导人才得乘坐。但他们哪里晓得，今天却是令局外人意想不到的例外，一路绿灯，车开得很快，只用了不到5分钟，就到达预定关押地点。

“江青下了车，惶惑地打量着四周，想搜寻着记忆，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自言自语地说：‘这地方好像我来过。’可是，最终她都没有找出答案。行动小组没有让她停留，随即把她带进隔离室内。

“江青被带进隔离室，我便告诉司机吴增彬掉转车头，飞快赶回怀仁堂。华国锋和叶帅坐在正厅外间，飘忽不定的思绪，看上去镇静中显得有些心焦。我急速地过去向他俩报告：‘江青已顺利拘押。’正准备向站立在西边的汪东兴报告，这时他已走过来，我又照样复述一遍。

“汪东兴带着戏谑的口气问我：‘江青又张牙舞爪地表演了一番吧？’

“我说：‘她见风转舵，还算顺从听话。’

“华国锋和叶帅听后，嘴角布满笑意。看得出，他们绷紧的一颗心，片刻显得舒展。三个人又从容地坐下，交谈处置‘四人帮’中最后的一个——姚文元。”〔8〕

## 2、张耀祠的“现场记录”

“一进她的办公室，她正坐在沙发上。我向她宣布：‘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由于我对江青的极大愤恨，我当时说‘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是我临时加上去的。

“在我宣布的时候，江青双目怒视，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听着，未发一言。她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会有这一天的。她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在地上打滚。

“我宣布完后，江青站起来，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拿了一个信封，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将信封两头用密封签贴好，顺手交给我。这时武健华同志上前领着江青出来。外面专门为她准备的红旗保险轿车在等候着，江青以一种惯常的姿态上了车，将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了。没有给她戴手铐，没有人向她扔纸团、吐口水。”〔9〕

## 3、马晓先的“现场记录”

“这时，张耀祠吩咐那些全副武装的军人守在外面，而让我和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几个人跟着他一起进到房间里面。这时，我想起了此刻在江青这里值班的护士应该是江慰琴。

“进了江青的办公室后，我看见江青正坐在沙发里。通常江青在办公室的时候，就习惯这样坐在沙发里，把脚放在跷脚墩上。张耀祠走到她面前，对她说：‘江青，我接到华国锋总理电

话指示，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一个地方，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自己回忆说：组织上交代的说辞中，并没有‘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守纪律’。这是他自己临时加进去的。

“在张耀祠向江青宣布那段话的时候，江青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表面上没有显出慌乱，但她的内心绝不可能是平静的。她等张耀祠把话说完，轻轻地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张耀祠就把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江青听完张耀祠第二次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后，才站起身来。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入一只牛皮纸信封里，折好口，拿钉书器钉好，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交给了张耀祠。

“这一连串的动作，江青做得不紧不慢，看似镇定自若。在这之后，江青提出要上一下卫生间。卫生间就在办公室的边上，张耀祠同意了，江青走了进去。张耀祠立即要我把江青的东西收拾一下，准备离开这里。

……。

“然而，当我把东西收拾好了之后，江青还没有从卫生间里出来。张耀祠也觉得时间长了点，就让我进去看一看。我进卫生间一看，江青正坐在那里愣神，显然她在思考着什么。我什么也没说就出来了，江青随后也出了卫生间。

“我们一起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我和江青坐上了一辆大红旗轿车。我记得轿车好像在地上走了一段，就驶入了一条地下通道，我也不记得走了多长时间，最后到一个安置江青的预定地点。那是一座地下建筑，她在那里住了半年之久。”（10）

### 三、对不同版本“现场记录”的几点辨析

1、江青在被拘禁时究竟有没有说话？说了什么话？三个版本的“现场记录”存在不同的说法。张耀祠说，自他们进入江青的办公室直至押送她上车，江青“未发一言”；马晓先说，江青只讲了一句话——“我没有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如将提出要去洗手间也算一句，那么总共就是两句）；而武健华版本，江青说了不下四、五句话，即“你们要干什么？”“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的？”“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那我这里的文件呢？”“那不行，这里许多都是中央的机密，我要对党负责，钥匙我只能交给华国锋。”等等。

如将未发一言与仅讲了一句话归为一类，那么，与说了多句话的说法是2：1，前者略占优势。

2、江青的表现。张耀祠记忆中当时的江青除“未发一言”之外，也“没有大吵大闹”，临未上车时是“以一种惯常的姿态上了车。”马晓先也说，“在张耀祠向江青宣布那段话的时候，江青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表面上没有显出慌乱”，“这一连串的动作，江青做得不紧不慢，看似镇定自若”。笔者认为，两人记忆中的，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江青。而武健华笔下的“伸长了脖子，瞪着眼睛”，说了那么多废话的江青，显然是以“为人奸狡刁滑、残忍刻薄、心毒手辣、则天武后之心不死的野心家”（武健华语）模式塑造出来的脸谱化的江青，这并非是生活中真实的江青。而今天在绝大多数媒体上出现的往往就是脸谱化的江青，真实的江青，难得一见。

3、有趣的是，被邬吉成和马晓先质疑并非在拘禁现场的武健华，他的“现场记录”反倒是最详尽、最生动、最活灵活现的！而这样的“现场记录”却是最令人生疑的。试问，当时现场行动这么紧张，事后怎么能将房子里的摆设都回忆得如此详细：“……身前摆着一张长方形不高的办公桌，桌上铺垫着白色的桌布，摆放着台灯、茶盆、茶杯、各类办公文具，还有几份文件。膝盖部位盖着一床小方毛巾被，脚底蹬着一块专门制作的脚垫板。地板上铺满厚厚的墨绿色羊毛地毯，房间周围停靠着几个书橱和铁皮文件柜。天花板正中吊着一盏形似花瓣屈伸的大型玻璃顶灯，放射着金黄色的灯光。”〔11〕

此外，他还提到江青当场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内称：“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12〕

张耀祠及马晓先都提到江青将钥匙放入一个信封里交华国锋，但绝无提及有这么一封信。而且，即使有这么一封信，武健华是否有权去看这封所谓给华国锋的亲启信还难说，匆忙中又如何能将这四五十字一字不漏地记下来？！

4、笔者倾向于相信马晓先女士的说法——武健华并不在现场。王凡曾问马，如果说武不在现场，“那怎么武健华的回忆文章，怎么能对拘禁江青这边的行动有那么详细的描述呢？他怎么了解得那么清楚呢？”马晓先回答道：“哦，在武健华写回忆文章期间，曾向有关的人员询问过我们这边行动的情况，他还向我询问过相关的问题。如果他当时在场的话，就没有必要向我们询问了。”〔13〕

武健华为什么要询问相关情况？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写回忆文章”？

当然不是。笔者注意到，有关10月6日晚对“四人帮”的拘禁，张耀祠称武参加了对毛远新、江青的行动；邬吉成称武参加了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行动，没有参与对毛、江的行动；而据武健华自己所称，他既参加了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行动（对姚宣布隔离审查和实行拘禁，武声称还是他单独完成的），又参加了对毛远新、江青的行动。这在中央警卫团中是绝无仅有的，言下之意，在决定中国命运的这一夜里，他最忙乎，功劳，自然也就最大。

这恐怕就是武健华要涉嫌虚构那些事实上并不存在而又号称“我在现场亲眼所见亲自行动”的场景的真正原因吧！

将本来没有的事情加以虚构，“无中生有”，甚至将自己放进一个虚设的场景中去，并“记录”了（实则伪造）详细的“现场记录”，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名人回忆录，这就是目前中国大陆造假成风而不以为耻的一个真实侧面。

然而，为什么张耀祠也坚称武健华在拘禁江青的现场？却是十分令人不解的。

一件本来不难核实的事情，也弄得如此面目不清，真假莫辨，这，也就是我们对当下那些名人回忆录抱有十二分戒心的原因。

不知道未来的历史学家如何去描述“粉碎四人帮”的这一个夜晚？笔者倒认为，最保险的是略去一切细节，只剩下一句话：

“1976年10月6日晚，中央警卫团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命，拘禁王洪文、



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毛远新，过程顺利，未遇顽抗。”

（2006年6月）

注释：

〔1〕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页239。张耀祠文中对武健华当时的职务叙述有误差。中央警卫局于1969年改称中央警卫处，故而武当时职务应是中央警卫处副处长而非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处迟于1977年11月方再改称中央警卫局，参见《关于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和中央警卫团组织调整体制改变问题的通知》，中央军委文件〔1977〕16号，1977年11月7日。

〔2〕〔9〕同〔1〕书，页240—242。

〔3〕武健华：《粉碎“四人帮”的实施过程》，原载《中华儿女》国内版2001年第10、11期，转引自李海文主编：《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二编（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页263。

〔4〕同〔3〕书，页271—272。

〔5〕邬吉成口述 王凡整理：〈我参与抓捕“四人帮”的细节回顾〉，《中华儿女》国内版，2001年第3期（总第166期），页35。

〔6〕王凡：〈马晓先女士谈江青〉，《历史学家茶座》2006.1总第三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2），页111。

〔7〕〔13〕同〔6〕书，页113。

〔8〕〔11〕〔12〕同〔3〕书，页272—275。

〔10〕同〔6〕书，页111—112。

~~~~~

## 【回首文革】

昨夜星辰昨夜风  
——青海日报“六·三”社论发表前前后后

·陈 逸·

南宋柴望著有《丙丁龟鉴》一书，是专讲谶纬学的。书中说，每一甲子六十年中，凡逢丙午、丁未之年，人世就会有一劫难；丙属火色赤，未为羊，故谓“红羊劫”。“文革”发动之年的1966年，正值丙午年，我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年的六月，我继1957年“反右”之后再一次经历了人生的一大劫难。

1966年6月3日，《青海日报》发表了一篇由我执笔撰写的社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以下简称“六三社论”），从此揭开了青海全省“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也开始了我多灾多难、诡异变幻的噩梦。

1966年6月2日下午2点多，当时《青海日报》社总编程光远（他同时兼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把我和政文部副主任雷经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安徽省分站站长）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有一项紧急任务，要马上写一篇社论，贯彻中央杭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精神，发动群众参加即将全面铺开的“文化大革命”。

程光远向我们传达了当时仍属高级机密的中央杭州会议、上海会议的大致情况（其实是自

1965年9月以来中央各重要会议的综合内容及其核心精神)，比较完整、详细地复述了1966年4月24日上海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通过的《五一六通知》(草稿)：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睡在我们的身旁。要不断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领域的领导权。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程光远在传达完这些主要精神后，认为作为党报要尽快跟上中央的部署，及时发表一篇社论，着重是广泛发动群众，要有很强的鼓动性，“要带着感情写社论”，“越快越好”，“争取明天见报”。

但，程光远在传达中，并没有告诉我们当时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已被停职、批判的情况，更没有提及罗瑞卿会中跳楼一事。

这篇社论似乎理所当然地落到我的头上，由我来执笔；原因是，在此之前，相当一段时间里，几乎都是我来写社论的，其频率之高，达到了一天一篇，有时甚至一天二篇。他之所以叫上雷经农，完全是出于程序的考虑。雷是政文部副主任，分管政法、理论宣传，这样的具有极强政治性的社论，不能不有他参与其中。

指定由我撰写，另一个原因是出于程光远的偏爱。正像后来批判中说，程光远在青海日报社有三支“黑笔杆”——除了我以外，另外二人是：王振业（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毕业，后为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孙正荃（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那时，《青海日报》上的一些重要报道和重头文章，程光远总是分别交给我们三个人去担任，这几乎已成定例。这次的这篇社论无例外地分摊到了我的头上。

听完传达，接受任务，就我当时来讲，觉得茫无头绪。主要是目标不明确，这“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谁？“发动群众”起来干什么，要“革”谁的“命”？但我预感到中央要出大事，既然社论重在“发动群众”，就在这方面做足文章，至于“革命对象”，即使是一虚拟目标，总有其人，且不去管他。

从程光远办公室出来，为了安静和争取速度，我躲进了报社的值班室，锁上门，一个人开始酝酿、构思。

当时，我除了笔录的传达精神之外，主要的参考资料便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之所以选择它，是觉得在“发动群众”这一点来说，这篇文章庶几近乎“煽动”、“鼓气”、“激情”，正同我们要写的社论基调吻合。

经过大约半小是的思考，连续吸了四支烟后，我就挥笔直书，以“气势”夺人，而少所论证；因为，已接近下班时间，我是写好一页，就送给雷经农初审，再由雷送程终审，我则回值班室续写，到第三页时，已是下班时分，我即告雷与程让他们先回家吃饭，待最后完稿时，我再送审。程光远当时先回了家，雷则在办公楼上等我完稿。我写完最后一个字时，已过了晚饭时间，即将最后两页交雷，并坐等其审完。

顾不上吃晚饭，在雷经农审定后，我拿着最后几页初稿，到省委部长楼程光远家待其签发。程光远在终审时，把雷经农删除部分全部恢复，几乎是对原稿一字不易地照发，他还当着我的

面，毫不顾忌地补上了一句：“乱改一气，文气都不顾……”

这，就是程光远的个性。程光远，河北省人，是以中等师范学历在革命部队中自学成才的老新闻工作者，为人温文尔雅，率直俭朴，虽不善言辞，但遇不平，即仗义执言，1959年曾因揭露青海省大量饿死人及大跃进中的冒进问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后恢复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兼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和青海日报社总编辑。当时他的主要精力在《青海日报》的编务上。他特别爱才，对有才华的编辑、记者总是另眼相待，相反，对他认为是“庸碌”者，则往往假以辞色，由此也得罪了不少人；他在编务上倡导民主作风，从选题到改稿肯于倾听下属意见，对他欣赏的一般编辑、记者，总以平等态度交流看法、交换意见，从不以总编辑的身份，执己之见以压人；他的最大问题是，不善与人同，一些特立独行、一些看不惯的人、事，脱口而出，毫不考虑影响和后果，也正因此，他在省委同僚中少有知己而有意无意地树敌过多，他曾对我说过，在省委常委班子中他觉得可与言事的，除杨植霖、王昭外，唯省委秘书长王仲方“有识见”；他总是在平时把自己的这种感受直接诉述出来，这种所谓的“自由主义”，使他在省委领导班子中种植了“怨恨”的春草；也正是他上述的“偏颇”，为他最终的悲剧埋下了“祸根”。但我不得不承认，程光远是一个好人，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的秉公无私、他的正直敢言、他的俭朴勤勉，他于事业的忠诚和执著，他对社会之毫无戒备的天真与不设防，在他那样的高级干部中并不多见。他最终竟以罗织罪名成为“文革”的“殉葬者”而被“开除党籍”，我不能不遗憾地认为这也属于“十年浩劫”目睹之“怪现状”。

经程光远审定的这篇社论乃于次日见报，是谓“六三社论”。

社论发表当天，就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编辑部电话不断，但大多限于询问发表这篇社论的意图，说“省委是不是要搞什么运动？”“矛头所向，是不是省委里有人？”……诸如此类；紧接着第二天，情势大异，先是来了一拨中学红卫兵，直接给报社送来了一张措辞严厉的大字报，声称这篇社论是“大毒草”，要求报社作出“说明”。年轻的红卫兵们还在省委办公大楼前楼的四楼——当时青海日报社编辑部所在地的走廊上大声喧嚷，并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要“程光远出来说话”，后经报社有关人员劝慰，他们把大字报贴在墙上后才离开，临走时还丢下一句话：“我们明天还来！”随之而来的则是更多的一拨一拨人群，有学生、有干部，也有工人，多是来探询这篇社论的“背景”、“用意”，也有来问“省委有什么部署”，其间也有携带来大字报的；但在当时，实际上已形成了两种观点，有的认为社论是“大毒草”，也有的认为“好得很”，“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无论持哪种看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当时编辑部已闹哄哄乱成一片，社论的即时效应如此快捷、猛烈，则是我们始料所未及的，编委中就有人忧心忡忡地说：“闯了大祸了！这是办报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六月四日下午，报社气氛进一步紧张，省委办公厅来了电话，说：“你们这篇社论是什么意思？现在社会上炸开了锅，我们这里电话不断，你们打扰了省委的工作。”省委宣传部也来电，要求报社作出说明。省委的沉不住气，加剧了报社编辑部的动荡情绪，也给程光远和我频添了更大压力。五日、六日，有更多的人涌进社来，大字报也越贴越多，以致省委大院内也开始参与到这股浪潮中来，有的部、委也有人写出了大字报，我在上、下班路上（从省委宿舍大院到办公大楼不过二、三百米路）已经明显感受到那些奇异、刺人的目光和在背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语的尴尬。在当时那样的纷乱局面中，我已预感到“大祸临头”，但又无法解释；经与程光远交谈，他让我去找省委宣传部部长午人去说明社论撰写的真实意图和具体过程，他示意午人对文中所指很有“对号入座”的味道，意见特别大。

大约是六月七日傍晚，我去省委部长楼午人的家，向午人就“六三社论”问题作具体说明。我详细诉述了社论写作的策划、撰稿过程，着重强调了社论是根据中央杭州会议、上海会议精神，本意在地“发动群众”，出发点是善意的，同时也检讨了我们完稿、发稿过于仓促、轻率的“错误”。午人，我是比较熟悉的，在他以省委宣传部部长身份主编省委机关党刊时，我曾多次

投稿，蒙他垂青，也曾以“笔杆子”称许于我；1965年6月，他曾单独约见我，让我撰文批判当时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静涛的诗词；其实，我对黄静涛的诗词并不感兴趣，但我当时把午人的交代看作是党的指令，我还是通读了黄公开发表的全部旧诗词，并写出了题为《严重歪曲时代精神的坏作品——对黄静涛同志的诗词批判》近5000字的文章，发表在《青海日报》上。恁心而论，黄静涛的诗词大多是因景抒情的感怀之作，用不着大动干戈地施以挞伐；但我仍然以“党的意旨”而违心“遵命”，其实我并不知道当时午人与黄静涛正、副部长两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更不考虑“政治因素”；我的这种信奉“遵命文学”的可笑的天真，曾使我写过不少这样的违心之作，包括“文化大革命”之前、之中的社论和论文。也是午人，就在1966年5月中旬，命我执笔撰写追查“三家村”“后台”的长篇论文。老实讲，我于当时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对彭真的真实意图一无所知，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十分欣赏邓拓的才华和文笔的，但当时午人告诉我：目前全国都在批判、声讨“三家村”、《前线》和《北京日报》，我们青海不能没有“态度”，他希望我来写一篇“重头文章”，“不要停留在‘三家村’，要挖它的‘后台’……”显然，当时午人已经完全知道毛泽东“揪出”“彭罗陆杨”的底细，但他却并没有告诉我这张“政治底牌”，而要我从“理论高度”、“政治高度”去分析、追查“后台”。我也同样以“党的指示”照办，我用了几天“熬夜”，几乎通读了《三家村札记》及当时的《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写出了《擒贼擒王》的长篇批判文章，以两版整版的篇幅发表。

应当说，我写的“六三社论”，一如午人当年交代我写的那些文章一样，在潜意识里把它看作是“党的指令”，是我职责内的“应尽责任”。然而，当我全面、真实地汇报了我写作社论的背景及全过程后，午人却并不认同我们的本意，他断然地认为这是一篇“矛头针对省委”的“别有用心”的文章，他还强调“这样重要的社论，为什么不交省委审定，擅自发表”，我即回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社论，省委都没有审看，因而这篇社论也是“并不例外”的常规做法；与此同时，他还特别问我：社论里说的“小脚女人”是谁？“东郭先生”又是谁？我说明，这只是“泛指”，并不“特指”哪个具体人。但不管我怎么说明，午人始终铁青着脸，并且告诉我，省委很快就要就这篇社论开会讨论作出决定，要我“准备接受处理”。至此，我已认定，转圜无地，泼水难收，弄文入网，我为“祸首”，只能等着命运的摆布了！

接下来的几天，真可谓“黑云压城”“风雨满楼”，省委要求省级各机关就“六三社论”明确表态，于是每天都有一拨拨人携带大字报来省委大院，以致省委办公大楼前楼一至四楼贴满了大字报，因数量实在太多，每层楼走廊都拉起了几道长绳，大字报一排排张挂起来，如同飘舞的蚊帐，还贴出了“小心火烛”的告示。大字报的内容当然是“一边倒”，“社论”已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我和程光远的“罪名”也不断“升级”，从“政治错误”跃变而为“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资产阶级代言人”、“混进新闻界的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大字报由前楼延伸到院墙及省委常委楼（办公后楼）。约在六月十二日左右，省委正式作出“决定”，宣布“六三社论”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予以撤销”，并申明“社论”未经省委审定，“系由程光远授意、陈逸执笔”，事先“炮制”的“向党进攻”的“动员令”和“宣言书”，着令“程光远、陈逸停职检查”，等待省委的“严肃处理”，同时派出了以省委副书记韩洪滨为组长的庞大的五、六十人的“工作组”进驻青海日报社。

青海省委如此仓促而又果断的作出这一决定，并非基于对社论的真是非的判断，而是出于当时重要的政治背景。“六三社论”发表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在西安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主持常务工作；第二书记、省长王昭时在北京，正为当时中央内部斗争的展开惶惶不可终日。原来，王昭曾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与公安部长罗瑞卿关系密切，罗瑞卿当时的处境，使王昭预感到随之而来的“革命”必将危及自身；他怎么也想不到，正在这“敏感”的“政治汛期”，由他主政的青海，突然出了个“六三社论”，招致了迅猛、强烈的政治冲击波，他不得不匆忙返青，企图以最快速度“解决问题”。这是在势逼情急之下作出的一个并非明智的选择，他当时唯一的想法是“灭火”，不使火势蔓延而牵扯到正处危局中的他自身；他当时那脆弱的“政

治神经”和对政治局势单向分析的线性思维，使他采用了“丢卒抛车以保帅”的“应急”办法，而没有考虑这一业已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全国性的大动荡及其更加严峻的现实与严重的后果；他轻信了他智囊们所提供的消极“策略”，以为牺牲了程光远和我，可以换取他被冲击的“平安”（后来的事实表明，正是省委的这一匆促“决定”，成了王昭“引火烧身”的“加速器”）。

这里，我要简略地谈谈王昭其人。王昭，河北省人，中等个儿，身体壮实，留平头，为人干练、泼刺，办事果决雷厉，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冀中任六县联委书记，是当时党内少有的年轻干才，1955年授中将军衔，曾任志愿军军政委；他从公安部副部长任内调来青海，是为整顿三年困难时期由省委书记高峰搞乱的政局和经济。他1962年一到青海，就大刀阔斧地整吏治，理顺经济，深入农村、山区，体察民情，群众中有“王青天”之称。杨植霖文静稳健，王昭锐利果敢，这一、二把手的配置，可谓“最佳拍档”；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突变”，青海可望出现“大治”政局。1965年夏秋之交，我与新华社记者王安、杨立本联手，由我执笔、采访、起草有关中共青海省委执政治省的专题通讯。我们曾在西宁市胜利公园宾馆（该宾馆仿照北京的钓鱼台格式建造，是专为毛泽东可能莅青准备的“行宫”，但结果毛迄未来青）四号楼“闭门”写作近半个月，最后以《做革命的转化论者》为题，写成长篇政论性通讯，《人民日报》以头版整版篇幅刊登；当时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命西北五省报（陕西、甘肃、新疆、宁夏、青海）全文转载。我在文中曾多处涉墨王昭治青的政绩及其思想亮点。王昭也曾通过程光远向我表达了他的“欣赏”之情，并说“省委宿舍大院里每晚最迟熄灯的就是陈逸家那扇窗户”，要省委办公厅干部坚持“好学”精神。应当说，当时王昭与我可谓“神交”；但当政治风暴来时，王昭基于“关系”考虑，却毫不留情地先把我“抛”了出去，以救“六三社论”导致的“冲击”之“急”；而王昭最终也未能避免因罗瑞卿一案株连之灾，于“文革”期间死于西宁南滩监狱。他之冤死和我之受迫害，使我想起了柏拉图所说的：政治“是必要的罪恶”。

且说省委工作组进驻报社后，首先找程光远和我分别谈话。我在与韩洪滨见面谈话时，一再强调申明，“六三社论”的初衷一如平常社论一样，是“应时”之作，别无两样，但韩一口咬定我们是“别有用心”，必须如实交代“政治动机”；我还提出，作为“社论”，不是一般署名文章，一经刊出，即是“省委声音”，作为“执笔者”，不能承担“个人责任”，省委、省报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应有责任”来，但韩洪滨（曾任中共山西大同市委书记）可说于文于理是个“一窍不通”的人，他根本不想听也不愿意听我的任何解释，他是按照“打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来”的既定方案行事的，他说：你这个不叫“社论”，是“大毒草”，“你的唯一出路就是老实交代你们的反党野心”。进驻报社的头一天，在报社全体职工大会上宣布“由薛可（省委副秘书长）代理总编辑”，一切事务均听命于“工作组”；同时，由工作组出面组织发动省、市、县直至街道、村镇送大字报“讨伐”“六三社论”及程、陈二人。这“火”就越烧越“旺”了，最后形成了全省性的“政治事件”，由此也导致了观点不同的两大派对立，青海省的“文化大革命”由此正式揭幕。

工作组对青海日报社动了“大手术”：一、程光远停职软禁在家反省，陈逸专派二人监守隔离别室，雷经农从中分化出来，要他“反戈一击”，以示政策区别；二、由省纪委副书记张全志坐镇报社，开展运动，要求报社职工（包括印刷厂）个个表态，人人过关；三、继续发动社内外群众声讨、批判《六三社论》；四、组织专人专版于1966年6月中旬在《青海日报》连续近半个月载文批判程光远、陈逸；五、继续内查外调，为“程、陈反党集团”的定性和组织措施预作基础性准备。

“六三社论”成为全国报刊社论被打成“大毒草”的仅有“特例”，而青海日报社此时运动来势之猛、声势之大也“史无前例”。我在六月十二日遭抄家后当天被带走“隔离”，我爱人当场晕厥，也不允许我稍有逗留；甚至当时正在省委子弟小学上学的我的孩子的作文也被批为“大毒草”。我则于此时从早到晚接受大会小会连轴批斗；批斗间隙，罚我到省委大院北近湟水的菜

地劳动。当时，同我一起被罚劳动的还有“右派分子”黄修一（原《民族画报》社社长，“反右”后发配来青海）、王复祥（笔名复羊，漫画家，在《中国青年报》社被划“右派”，平反后调《人民日报》社工作）、反动学术权威“吴宝基”（老摄影家，当时享受行政11级待遇，他因曾给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照过相而在“文革”中“怎么也说不清楚”）等。在抬石劳动中，我与王复羊分在一组，他比我年轻，每次抬石，我在前，他在后，他总是把重头后移，以减轻我的负重；他自“反右”来青海日报社后，大小会议一言不发，平时更少与人来往，而正是在同我共同劳动时，乘监工者不注意，悄悄地传话给我：“要挺住！注意身体！”寥寥七字，给我当时苦涩的心灵注射进了一脉温馨，至今我仍然感谢他在患难中给予我的这份真情。

政治风暴是人情起落的温度计，政治运动是人性善恶的过滤器。正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时空错乱、社会动荡的“红海洋”里，各色人等的真面与变脸、本性与矫情纷繁上演，原态呈现。随着报社运动的深入，几乎每一个人都要“滤洗”一遍，最低限度是要贴出大字报表态。有一天，我在监管者监督下到走廊上看大字报“接受教育”，恰逢编委张铁民（后调任安徽日报社总编辑）搬一张凳子艰难地向墙上贴大字报；铁民为人忠厚敦实，生性不与人斗，我和他平时交谊颇深，他的双手患有间歇性痉挛性颤抖，此时他同我正好四目相对，他的双手越发颤抖得厉害，从他的眼神里我读到了“无奈”、“歉疚”，还有椎心的“痛苦”。他的被迫、违心而又不得不然之窘境，久久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我谅解他当时的处境，而埋藏在我心底的则是对于政治运动无端无情戕害人之良知与心灵的无限悲愤。同样因为政治酶酵引发人情的浇漓与本性的位移的，也有相应的例子。当时分管政法宣传的责任编辑钟在学（后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青海记者站站长），曾同我无话不谈，他自称是我的“好朋友”，而当“六三社论”出事后，竟成了批斗我的“急先锋”，专在“挖根子”、“查家谱”、“算旧帐”、“戳灵魂”上下功夫，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我并不在乎他批判的“深度”、“高度”及超乎寻常的“质量”——因为这样的“批判”，我在那时已“听出老茧来了”；我所奇怪和难于理解的是一个熟悉的“旧友”何以朝夕之间陡变而成陌生的“仇敌”，是什么导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得以成为历次运动的常规？“十年浩劫”固然给我们带来了灾难，而充斥于其间不定的变数，却也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人、事的真实。

湍急翻滚的政治洪流，让“一切都浮出水面”，在“知识分子成堆”的报社，人们都以各自的唱、做、念、打扮演不同的角色。有高调邀宠者，有落井下石者，有乘机爬杆者，有变色求生存者，有首鼠两端者，有卖友求荣者，有味心售奸者，有心地阴暗的告密者，也有赤膊上阵的打手……，其中如原在《中国青年报》社分发稿件的王某某，属不识“之乎”的新闻“外行”，来青海日报社后忝为“记者”，却写不出一篇象样的报道，此时却以吆喝高声、出手狠毒而成为运动“骨干”；又如身居部副主任的牛某某，曾在批判编委、总编办主任左凤文时，兜出左与他某月某日自省委下班回老报社印刷厂宿舍路上西宁宾馆墙角处讲的“悄悄话”，当有人质疑其“揭发”的真实性时，他声言：“我有一个小本本，把每天发生的新鲜事，听到的有意思的话，都记在这上面……”闻者当时为之惊悚；这时他再一次大显神通，充分发挥那“小本本”的作用……。仅此两例，也足可见其时报社人心之一斑。

当然，除了“运动”别人的人以外，也有不少受程、陈牵连的“被运动”而备受折磨的“冲击对象”。当时任经济部副主任的古洪、卢正云、吴仲宣等，都成为“靠边站”的“批判对象”；李镇欧（文艺编辑、后任青海日报社编委）、孙正荃则被目为我的“密友”，被反复责令“揭发”“交代”，久久过不了“关”——甚至到了1977年“文革”已经结束，他俩仍被当时青海日报社总编辑史进贤（原青海省交通厅厅长，就是这个史进贤曾因“文革”初期害怕工人揪斗，托厅办公室主任、我的老朋友李智增来我处求情，去劝说工人“放他一马”，我亦为其解缚而躲过“一劫”）以“清查5·16分子”陈逸“同党”的“罪名”，与我一起先后被投进南滩监狱，遭致近一年或一年多的囹圄之苦。

运动继续深入，为在报纸上公开大规模地批判我和程光远的“罪行”，由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史克明“挂帅”，搜集我们过去曾经发表的文章，于1966年6月17日分别编辑了程及我的“选集”，内部发行，提供“子弹”。当时，这一“选集”是“保密”的，附有省委工作组办公室的“通知”：“为了进一步深入揭发、批判陈逸的问题，我们将陈逸在报纸上发表的部分文章汇集成册发给大家。这个材料是内部材料，不得外传，不得丢失，用后收回。”这本“选集”，我一直到被解除隔离后的9月份，才得以从报社政治处获得一份。在我匆匆翻阅一过后，即在封面上写下了我的“感言”：

“这是我手头保存的仅有的一本‘作品选’。作为作者，我对编辑者——青海省委并不感谢，而是有些意见：

第一，出“选集”，不出“全集”，我深表遗憾。我在全国性报刊和各地发表的作品，收集不全，编者失职，该打该打；即使是省报的也不全，不署名的社论就差得很多；

第二，装帧粗糙，编者几乎没花什么劳动，只依文排列，这样的编辑只配吃干饭；

第三，校对极差，错讹甚多，以致影响我原作表达，如再来运动，兴文字狱，我是不认帐的，抱歉啊抱歉！

陈逸 识 1966·9·

这里，还须要提到是，由于工作组一心忙于罗织罪状，竟将我与别人合写的文章也搜罗在内，殃及无辜。例如，我于1963年与李来予（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文艺责任编辑，后调湖南常德地委工作）、姜克宽（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曾任总编室责任编辑，后调《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工作）联手以“雪里红”笔名发表的系列文艺评论，就误入“黑书”而成了当时公开批判的“靶子”。这一“批判”延续近半个月；而当1977年史进贤以莫须有的“5·16分子”“嫌犯”制造冤案，将我投入监狱时，竟又一次利用职权在《青海日报》上对我开展了连篇累牍的“笔伐”。这种“以言废人”、巧织文网、舆论造势、飞黄诛心的做法，也是“文革”期间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在中国新闻史上也留下了一个可供探讨的专门“课题”。

口诛笔伐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对我人身的直接迫害，在监管软禁限制行动自由之后，勒令我从省委宿舍西四楼二楼搬到东一楼三楼居住。西四楼当时为省委办公厅干部宿舍楼，当然不允许一个“反革命分子”孱杂其中，而东一楼三楼的住房是靠北阴面的一个杂物间，从未住人，是临时关押“五类分子”的处所，终年不见阳光，秋末开始，墙上就结满霜花。我在监管人员看押下，与弱妻幼儿一起吃力地来回搬运家什，几乎在这儿住了整整十年。青海高寒，冬天来得早，气温常在零度以下，为保暖越冬，夏末开始，家家都要提前作好御寒准备，这于我家居所尤甚；在当时我被关押处境下，不得不以“囚徒”之身，远赴大通煤矿运煤，煤运到后又携妻将雏卸煤、铲煤，而劳动量最大的是托煤坯；当时连煤坯模子都难借到，也无人敢公开帮我打煤砖，我只得央求监管人员“法外开恩”，于夜黑人静之时，在东一楼外空地上与妻儿一起担水和煤，搀泥托坯，连续半个来月，全家人天天累得腰酸背痛。也正是在这“苦役”式的劳动中，我才更加体会到了“友谊”的真诚与可贵。当时，孙正荃、王均旺、刘旭初、孙其专、陈炳诚、项加（均为青海日报社编辑、记者）等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于深夜月下分别来帮我卸煤、打煤砖。当我劳动完后，仰头望着那高原清冷的圆月时，一种悲凉之情就会陡然涌上心头，我一下子想到了十七世纪因科场案被流放到宁古塔的吴汉槎，那苦味、苦况使我不止一次地背诵顾贞观赠吴汉槎的《金缕曲》：“……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它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因文兴狱，劳身苦心，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大抵古今皆然。

到了八月下旬，情势有了突然的变化。外地来青海串连的红卫兵大批涌到，青海本省也出现了“8·18红卫兵”等各类群众组织。奇怪的是，所有外地红卫兵不论他们在本地各有多么不同的观点和派别，而在青海却都站到了肯定和支持“六三社论”这一边；青海本省的“8·18”红卫兵、工人组织也都在这时公开表示了积极支持“六三社论”的意见。这时出现了又一个大字报高潮，不过这大字报的矛头所向已是青海省委，每天都有一批一批红卫兵和工人群众来到省委，高音喇叭汽车也开到省委门口从早到晚播放口号、毛主席语录，一些外地中学红卫后就直呼“王昭”之名，要他出来说话；青海日报社更是关注焦点，一拨一拨红卫兵直接来采访我，并向省委工作组讨说法，韩洪滨、张全志、史克明、薛可成了冲击重点对象。在这一汹涌浪潮下，省委门口的警卫岗哨也被迫撤除，报社工作组不知何时也已悄然撤退，我则被无形中解除监督，省委已处于瘫痪状态。

当时来青海串连的红卫兵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市，其中有不少是高干子女，而最后一直坚持于青海“文革”运动的有：北京地质学院体育教师冯国良、北京广播学院张金莱、刘凤池（张、刘后分别在浙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任播音员）、哈军工辛铁生、北京女红卫兵张苗苗等，他们以“革命的赤诚”，经历了青海高原“文革”的血雨腥风，也正是这些年轻、单纯的红卫兵执拗而又不畏艰辛地奔波于北京、青海之间，硬是把“六三社论”问题捅到了中央文革，在取得当时康生、戚本禹“肯定”“六三社论是革命文章”、“作者是想革命、要革命”的“表态”后，青海“文革”形势大转，一时间，以达洛、刘明乾为首的青海师院“昆仑红旗”、以王中山为首的“8·18红卫兵”、以马集文、隆光前为首的“8·18工人造反团”（上述诸人后皆为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旗帜鲜明地向青海省委“挑战”——以“六三社论”为导火线、以青海日报社为“焦点”的更加残酷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我在这一期间，因报社未能安排适当工作，即应王中山之邀创办《八·一八红卫兵》报。在此期间，有关我和程光远的“传单”到处印发，“打”“保”均有。其中涉及我的最阴险和最可笑的是由报社一些人给我强加的“罪名”——“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最大也最难讲清的是“恶攻”罪名；因为“恶攻”内容不得重复，如果重复述出也就等于你也陷于“恶攻”境地，从而可判“重罪”。那么所谓我的“恶攻”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在“文革”之前和之初，我曾对郭沫若的《百花齐放》诗作及其表示要“全部烧掉”旧作一事表示异议，曾说过：“《女神》已经远去”，“矫情邀宠，违心保命，郭沫若自己打倒了自己……”这是我在政文部一次会议上的即兴感言，却不料被人险恶地挂靠到“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纲”上，这也是“文革”期间常见的“刀笔功夫”，真是“用心良苦”！记得梁漱溟曾有评郭沫若一律：“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支。”郭沫若晚年的无奈辛酸，正是中国政治造就文人悲剧的一个典型。

此后，青海“文革”愈益走向无序化的纷乱局面，报社内部涌现了各种各样的“战斗队”，社会上“武斗”风起，正常生活已处于“粥状”而无人收拾。我这时已远离报社运动，受“8·18红卫兵”总部委托，我和报社刘守和（天津人，编辑）到北京建立“联络社”。承当时首都三司《东方红》报总编、北京地质学院学生聂树人（陕西人，后调青海地质研究所工作）热情安排，在北京地院13号楼设置了一个办公室，自1966年11月起至1967年2月底，几乎每天晚上11点后与中央文革办事组宋群（原《解放军报》总编办主任）通话，汇报青海动态；宋群基本上不说话，只是记录通话内容。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同我们一起在“联络站”工作的，竟然是原青海中学红卫兵的“司令”、第一个向“六三社论”“开炮”、带头送第一张大字报来报社的西宁实验中学女学生李春荣。她这时已成为坚定的“六三社论”支持者，给我在京时的工作、生活诸多照顾。正是杨花落尽葵花开，旧波还逐新潮来，快速运行的历史转轮，为“文革”十年留下了多少晕眩，多少疑猜！



时间到了岁末年初，青海局势进一步激化，军队也开始介入地方运动。1967年2月中旬，青海日报社被重兵包围。这期间，青海省委、青海日报社多次派人来京，企图追捕我和程光远回青——其时，程光远也因上访来京，暂住左家庄国务院招待所；因信息及时，我被地院王大宾、聂树人转移至图书馆楼上，程光远也安然脱险。2月20日左右，有外地红卫兵陆续冲出报社重围，来京反映情况。当时情势已十分危急，我向中央文革办事组汇报了实情，并指出“发展下去可能死人”……果然，几天后，青海日报社被围困九天九夜后，终于发生了耸人听闻的“2·23”流血事件。当时，由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总后勤部兵站部政委陈郁文、二炮驻青某军副军长张晓川（青海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因赵永夫夺权被禁）直接策划、指挥，从草原调来包围青海日报社的外地军队在不明西宁“文革”来龙去脉情况下，以“镇压反革命”之名，于2月23日深夜公然开枪，当场死亡群众300余名，第二天凌晨，又有上万名群众被捕入狱。其时，我爱人谢端尔亦在青海日报社老报社旧处（此即被重兵包围的惨案发生地）被五花大绑地押赴南滩监狱。而在此期间，我的孩子陈平、陈路分别为11岁和不到10岁，因外面的恐怖气氛，不敢出门，竟以其母医用的葡萄糖针液充饥；“2·23”后，在无意中发现枕下有钱，乃冒生死危险到车站买火车票千里南下，他们穿着单衣裤，忍饥挨饿，形同乞丐般到他们杭州大舅舅家避难，当大舅舅找到他们时，两人蓬首垢面，几不敢相认。这种祸及子女、举家沉沦的悲剧，在“文革”期间各地多有上演。

由于信息阻隔，真相不明，一时间传说纷纭，据传“2·23”后次日，赵永夫即获林彪嘉许，肯定为“镇压反革命事件”，但在当时的老报社内没有搜出一支枪支，更没有发现任何反击迹象；到了3月初，真相逐渐明朗，乃由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出面、周恩来总理主持，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将“2·23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军事政变”；紧接着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开有关青海问题的大会，传达中央关于青海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当时仅将军即达百人以上，我也参加了这一大会。会后不久，我即随中央工作组、外地红卫兵等乘火车返回青海。

之后不久，我同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副司令员张江霖见了面，并共同筹组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事宜。在这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是当初刘贤权一再提议要我进省革委会常委班子，我坚持不受，并亲笔将我的名字从筹组名单中划掉。原青海省副省长韩明的老婆王秀明（原青海日报社文教责任编辑、后调山西省政协工作）曾于2004年《老照片》小报上载文忆述“文革”，称我为“激进派”，其实，我当时已倦于运动，想着“急流勇退”，我是一个“勇退派”；只是1967年春夏，我主持过《青海日报》的一段编务外，基本上游离于运动之外，多借口爱人病和南下探亲，较长时间滞留于沪、浙之间；尽管我多方设法远离“运动”，但“运动”总是要找着我。“文革”十年间，我先后多次被招回报社接受“批斗”，直到1977年我在浙江绍兴休假期间，仍因史进贤的陷害，被诬“5·16分子”、“恶攻反革命分子”而从绍兴“揪回”投入监狱；被囚期间，我因不服抗议，甚至一度戴手铐及20斤重的脚镣被关进橡皮死牢。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散了我头顶的乌云，终于被无罪释放回到了正常的人间。

第二件事是，当我从北京返回青海时，中央文革交代要与原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同行；而当时杨植霖正被青海省委办公厅的一派（系二位副处长）挟持。行车途中，杨植霖借机向我表示要摆脱困境的愿望，我当即让外地红卫兵去同那两位副处级干部交涉，把杨从他们手中转移到我的车座旁，一直陪伴他回到西宁，并在省干部学校院内把他秘密保护起来。当初，我以为杨植霖应被结合进省军委会，但刘贤权却告诉我：“中央还没有最后定。”在这一时间，我几乎天天同杨植霖在一起，约有二十多天。杨植霖文质彬彬，宽厚镇定，他于“文革”中受冲击几无怨言，显示了一个老革命的素养与内力，他从不向我述说当年的光荣经历和劳绩，也不旁及同僚的是是非非，多是我与他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直到他被称为“大特

务、大内奸、大反革命分子”在报上公开批判、由中央直接调走，我才与他分手，后来他“解放”出来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我也始终没有同他联系。但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他在我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形象。十年“文革”，一如砺石，不老的宝刀几经磨砺，依然闪耀出夺目的光亮。

“六三社论”发表已经整整四十周年，“文革十年也在时间轻风的吹拂下，淡化为远去的烟云和不堪重温的旧梦，但我还是同意萨特就中国文化大革命所作的常识性判断：其一，想象这种“爆发”完全能由某些人的意志发动，并仅仅限于上层建筑领域，是错误的；其二，宣布个人的完全自由，同时又在他的头脑中塞进所谓“毛思想”，这不是在创造一个完整的人，这二者绝对是互相矛盾的。

四十年如逝水流波，“文化大革命”已经走进了历史深处，它是一道可供后人凭吊的塞外苍凉风景！

“此情（景）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

# 【当事者说】

## 陈伯达的第一次华北之行

• 王保春 • 王文耀 •

### ◇ 出发前的请示

1967年的下半年，全国形势很乱，大部分机关处于瘫痪状态，基本上是由当地的驻军支撑。中央号召各地两派联合，建立新的机构即革命委员会。

陈伯达出于关心河北地区（属陈分管的地区）问题，他向毛主席请示，想去河北地区看看，促进他们的大联合。主席听了以后当时犹豫一下，对陈说：现在外边那么乱，是否一定要去呀？如果一定去，那时间不要太长。陈伯达回来对我们说：“主席是出于对我的安全考虑，其实没关系，我又是管华北地区的。”

12月22日，汪东兴就通知王保春和中央警卫局二处处长邬吉成到他的办公室当面交代：“伯达同志这次外出去河北，地方上情况复杂，你们要保证首长的绝对安全。如果发生什么问题，你（指邬）和王秘书商量解决。你再带上几个人去，你们统一指挥，随时与我联系。”这说明陈伯达向主席请示以后，主席是有所交代的。

陈伯达把他想去河北的请示也报告了周总理。总理考虑到河北省即将成立革命委员会，李雪峰已被内定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就主持中央开会，决定李雪峰随陈伯达一起去河北地区先接触群众，进行工作。

12月25日，由康生通知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在京西宾馆开会并听取汇报和部署陈伯达的行动路线和交通工具。

我们当时的工作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1967年12月25日（星期一）

下午2点到京西宾馆参加华北军队领导同志会议，听取汇报。参加会议的有康生、吴法宪、杨成武、李雪峰、郑维山等。

原决定先去保定，后改变计划先去唐山。安排坐飞机去，同去的有李雪峰、郑维山同志。

这时已是1967年12月底，出发前我们做了些安排准备工作。决定王保春随同陈伯达外出，王文耀在家看摊。至于其他随行人员，陈伯达让王保春通知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史敬堂同志去，并请他再带一人同去。史敬堂告诉王保春说：李准同志年轻老实，人不错，让他去行不行？王保春说：行，就带他去吧。

#### ◇ 第一站唐山

12月25日晚上7点多钟，我们乘专机出发。同去的有李雪峰、解学恭、郑维山等。到达唐山后住在某军军部，听取了陈军长、廖政委的简短汇报以后，当天夜里就同当地驻军的全体领导人进行了约一个半小时的座谈，并作了第二天的工作安排部署。

唐山两派斗得一塌糊涂，一派叫做路东派，一派叫做路西派。陈伯达听了汇报以后，向两派说：什么路东派、路西派，都是革命派，大家都要大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陈伯达走到工人中间做工作。走到哪儿就讲到哪儿，讲话很多，就是一个主题，讲革命的大联合，就是要“抓革命，促生产”。王保春让随去的史敬堂、李准同志认真记录，给他们的任务就是陈伯达每讲一次话，整理出一份记录稿。

陈伯达还到唐山矿区，下矿井，到生产第一线会见工人，做两派大联合的工作。还分别给两派开座谈会，让他们不要打派仗，要团结。

有一次，陈伯达正在开一个座谈会，有人反映说，某派有武斗的武器，就放在开会的这座楼里。顿时大家就紧张起来，在知情人的指领下，慌慌张张地跑去搜，还真搜出武器来了，驳壳枪和步枪都有，都是原来民兵的枪支。陈伯达让把这些武器都交给了军管会——当地驻军某军保管。

按原计划，26日离开唐山，但是陈伯达对他自己在矿井上的讲话觉得有些不妥，总感到不安，怕引起副作用。因此，决定再停留一天，继续做两派的工作，分别找他们谈话。离开唐山前又将两派的人召集到一起，开了个促使他们革命大联合的大会。会上，由于陈伯达的福建话别人听不太懂，他怕群众听不懂而引起误会，就临时请随同去的邬吉成当口头翻译。陈在会上号召两派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在场的人对他的这些讲话，还是比较满意的。

陈伯达在唐山停留了两天，促进了大联合，自己认为基本满意。于是，在27日下午离开唐山去了保定。

我们当时的工作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1967年12月26日（星期二）

上午10点接见唐派（三代会）和矿院派的双方代表，伯达、雪峰、维山先后讲了话。12点去东山矿区，先到兵营吃午饭，下午接见支左部队和各矿造反派头头，听取了他们的汇报意见。下午4点下矿井（二矿），7点上来，8点接见了二矿革命委员会的同志和少数派的人，

参加接见的有某军陈军长、廖政委，伯达同志接见时讲了话。原计划接见之后就去保定，但因为伯达同志对自己在矿井上的讲话总感有些不安，怕引起什么副作用，临时决定停留一天，再接见一次双方代表，当天住在机场。

12月27日（星期三）

上午9点，吃过早饭到某军军部，再次接见双方的代表，“三代会”、工人基层组织。总的感觉是，老年人的工作好做，老太太看到造反派他们打解放军都非常气愤；而大学生的工作不好做。总之，基层的群众要求办学习班的多，要联合成立革委会的多，要求搞大联合的多。伯达在会上向他们提出“三同”，同吃、同住、同学习。伯达说：你们是多数，向对方做工作，第一不要性急，第二要把困难估计得多一些，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使群众站到你们一边，他们谁只要敢于下手，就等于自己打倒自己，这样就是你们自己胜利了。但是，也有可能你们自己内部分裂，你们现在在矿总面前团结起来了，但是如果矿总一倒你们怎么样呢？有人是极右的，但他是用极左的面目出现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们要相信群众，相信毛主席，相信毛泽东思想，你们在每做一件事情之前首先要考虑一下看对谁有利。你们不要用我的话去压人，我因为年纪比你们大一点，只能提供一点情况供你们参考。凡事不能过急，大联合好，但是要创造条件，如果你们搞得好，对全国都会有影响的、有作用的，你们可以对家属做工作，不要到矿山去。

伯达在接见了“三代会”的代表之后，又接见二矿的双方，陈说：（摘抄）你们对我昨天的讲话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批评，也可以上纲高一点。老工人最反对武斗，反对分两大派。我看到要提个口号叫做“向老工人学习”。保错了人是可能的，你们双方可能都有，对犯过错误的人，要给人家改正错误的机会，一看二帮嘛！唐山煤矿对国家负有很大的责任，希望你们共同搞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出来。你们双方各自多做自我批评，避免批评对方，你们可以去请教你们的父母亲。

接见过矿总的学生之后，又去查看了矿院的双方武斗现场。陈、李、郑三位分别讲了话。

……

一切以为妥当之后，下午4点15分乘专机离开唐山到定县机场，然后转乘汽车，下午6点到达保定，由三十八军军长李光军、政委王猛迎接，进驻三十八军军部。

## ◇ 第二站保定

保定也是分成两派。由于支左部队分别为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两派群众争执不下。陈伯达到了以后，上午听取三十八军军长李光军、政委王猛的汇报；下午听取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等的汇报。紧接着就去做群众的工作，分别听取他们的意见，促进大家联合起来，不要打派仗，要团结。并且亲自去查看群众组织什么“敢死公社”、“飞虎队”在武斗时占据的现场，还走进工人宿舍进行说服教育工作。28日下午出席了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召开的群众大会，他在会上讲了话，号召他们大联合，支持部队的支左工作。

陈伯达在保定还去过好几个工厂，促使他们大联合。他到一个造纸厂，得知这个厂是专门生产高级铜版纸的，是供印制人民币和毛主席像用的。陈伯达就对职工说：你们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所以你们一定要保证质量，把生产促上去，这就是革命的具体体现。保定胶片厂分成两派，一派叫做“硬骨头”的被赶到厂外，不生产。他在职工大会上说不应该影响生产，提出“我们大家应该欢迎‘硬骨头’回厂参加生产”的口号。陈伯达还去了保定师范学校，接见全体师生，进行说服，促进他们大联合。

1 2月29日下午，陈伯达在河北省军区大院，接见了保定市各派组织的头头和军区支左干部，向他们讲了五条意见，中心意思是要团结，求同存异，促进大联合。

晚上又在三十八军军部大礼堂，接见了保定地区的22个县的负责人和军队支左干部，同样号召他们要搞革命的大联合，要团结。

1 2月30日上午刚吃完早饭，准备离开保定时，只听见外边敲锣打鼓，口号声响成一片，热闹非凡。一看原来是保定市两派群众抬着大联合的牌子和报喜队伍拥向三十八军的驻地。陈伯达和军队的领导同志高兴地接见了他们，祝贺他们大联合。

#### ◇ 第三站石家庄

陈伯达匆匆由保定飞到了石家庄。石家庄较为平静，两派纷争没有那么激烈。陈伯达的心情比较愉快，提出要到革命圣地西柏坡去旧地重游。在某军军长徐信的陪同下坐车前往，路上几次下车访问农户，向他们问长问短。

从西柏坡回到石家庄以后，参观了几个大的工厂，分别接见各厂全体职工，并且作了热情的讲话，赞扬他们“抓革命，促生产”做得好，应该向他们学习。紧接着，又去了石家庄市第一中学，接见了全体师生员工，讲话中谈到教育革命问题，向他们提出“向工人阶级学习”等口号。

3 1日下午，出席了石家庄市、地委，专区的革命委员会代表联合召开的座谈会，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共同座谈、讨论如何搞好“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

1 2月31日晚上，他们在市中心的“八一”大礼堂，组织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联欢晚会，陈伯达出席了晚会并在会上作了热情的讲话，观看了群众的文艺演出。

第二天是1968年的元旦，天气晴朗，他们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有群众游行，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好不热闹。

上午10点半，陈伯达、李雪峰、解学恭、郑维山等在石家庄市领导和当地驻军的负责同志的陪同下，登上检阅台，观看群众游行。台上台下互相频频招手致意。游行庆祝活动大约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

#### ◇ 第四站邯郸

1月1日中午，到邯郸。下午听取军分区和某炮兵师领导同志的汇报。了解到这里的武斗情况，知道他们分什么“地总”和“市联委”两派。

第二天上午，陈伯达就去找“地总”的负责人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且到现场查看他们的工事和武器。接着又去“市联委”，也发现有不少武器。

下午，将两派的头头召在一起开会，和他们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要他们搞大联合，不能搞分裂，并且让他们一定把武器交出来。他们虽然没反对，但交出不那么痛快。在这同时，陈伯达派王保春和郭吉成带人去“地总”、“市联委”、“邯钢”等群众组织的驻地查看，在“地总”查出8支手枪来。这时，陈伯达让当着群众的面交给“地总”的头头，并请他们自己把这

些武器交给有关部门。并告诉所有群众组织，有武器都应该自己去交给有关部门，不能私藏武器。

1月5日上午，王保春接到叶群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说中央有事让陈伯达赶快回北京。

当时，王保春接到叶群的电话还纳闷儿，他想中央开会应该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通知，怎么由叶群电话通知呢？叶群在电话里没有告诉王保春，只是找陈伯达。陈伯达接完电话以后，对王保春说：你安排一下，马上回北京，家里有事，要开会。当时陈伯达没有具体说，其实就是解决戚本禹的事。陈伯达在外地兴致正浓，根本就不愿意回北京，但是叶群告诉他是主席的意思，他不得不回。陈伯达匆忙向李雪峰等同志交代了一下，说中央有事，就此分手，直飞北京。后来知道，林彪很少出席中央会议，多数是叶群代表他出席的。会上决定处理戚本禹，毛主席说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组长不在就处理不好吧！这样让叶群通知陈伯达速回北京的。

这就是陈伯达的所谓第一次华北之行。

□ 《党史博览》 2006年第5期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